

纪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

# 抗日根据地 文化建设研究

张卫波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纪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

# 抗日根据地 文化建设研究

张卫波 著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张卫波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638 - 2400 - 7

I. ①抗… II. ①张… III. ①农村革命根据地—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65.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3380 号

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

张卫波 著

---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 - mail [publish@cueb.edu.cn](mailto: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9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400 - 7/K · 20

定 价 35.00 元

---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变得更有生机、更加坚强,即所谓:“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次最痛苦的同时是最强有力的锻炼,这才真像铁在熔炉里一样,经过烈火的熔炼,经过铁锤的打击,渐渐向着变成钢的方向走了。文艺的活动,在抗战的过程中,也跟着整个民族的活动一起,愈更地有生气,愈更地坚强起来。”<sup>①</sup>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的,它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

与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相比,抗战时期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突出文化运动的民族化、大众化,倡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期间,根据地文化界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问题进行探讨外,还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文化历程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思想基础。这对抗战时期乃至之后的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对当时的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变革和社会文化变迁,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从时间上来讲,经历抗战全过程,艰苦漫长;从空间上来讲,遍及大江南北,包括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根据地;从形式来讲,既有现代形式,也有旧形式;从内容上来讲,涉及文学、艺术、新闻等多方面。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局部实践,孕育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要素。

<sup>①</sup> 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文艺战线》第1卷创刊号,1939年2月16日。

时光荏苒,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对抗战时期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很多细节已经无法详细还原,然而,当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再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时,仍然会有很多感悟。这无疑会使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化“来时的路”和未来的趋向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正是本书的写作意义和意图所在。

目前,国外的相关论著有: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弗里德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戈尔茨坦《中国革命和殖民地:1937—1945,来自延安的观点》,尼克·奈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哲学家——艾思奇、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等。相关的见闻录和回忆资料有: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等。

国内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郑立柱《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精神生活研究》,刘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王海军《真理的追求——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朱鸿召《延安文人》《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张希贤《延安文化探考》,洪认清《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王敬等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史》,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廖永祥《新华日报史新著》等。同时,梁星亮、杨洪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王晋林、秦生的《新民主主义模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亦文、齐荣晋的《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史稿》,肖效钦、钟兴锦主编的《抗日战争文化史》,涂文学、邓正兵主编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王剑清、冯健男主编的《晋察冀文艺史》,冯崇义的《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冯崇义、古德曼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唐正芒等人的《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册),王先明、郭卫民主编的《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另外,国内相关博士论文有:张海燕《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1937年至1942年为中心》、张正光《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陈欣欣《延安时期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研究》、焦金波《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郭德钦《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等；硕士论文有：张慧霞《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研究》、杨荟娟《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的翻译及其影响》、许华卿《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许冲《〈解放日报〉与毛泽东思想社会化》、徐淑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报刊事业研究》、刘世忠《延安文化人群体研究》、殷福东《〈解放日报〉整风宣传与政治动员》、覃林《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的创新》、秦彬《〈新中华报〉在延安文艺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刘甜《抗战时期〈群众〉周刊研究》、冯田芳《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出版研究》、张良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出版”研究》等。

这些成果着重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其一，关注知识分子群体对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其二，考察抗日根据地文化政策方针，特别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其三，关注到根据地报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影响，肯定了报刊对抗战时期“民族形式”争论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对《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中国文化》等报刊的个案研究有一定进展；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对这些报刊内容和形式的影响。

其四，对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大众化成就，特别是秧歌、新京剧、木刻、漫画方面的成就进行梳理和研究。

其五，对根据地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艾思奇、张如心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探讨。

这些成果是本书写作的重要基础。鉴于以往研究已经比较多，并且根据地文化是一个综合的宏观概念，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因此，为了突出重点，本书在写作时，没有做到面面俱到，而是着重论述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从新启蒙运动着手，考察根据地文化的源头，并对中国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进行梳理。

二、从时局变动、文化流变等角度，探求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特点和影响。

三、考察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特点，着重探讨根据地文艺社团和学术研究社团的建立及作用。



四、探究根据地报刊兴盛的缘由,并对根据地报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梳理。

五、考察根据地文艺运动方针转变的过程,并对根据地“文化下乡”运动的兴起、特点及其对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推动作用进行深入挖掘。

六、着重对新秧歌运动、平剧改革、文艺大众化、美术民族化、文化知识的普及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特点。

七、对根据地文化界的“民族形式”论争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中国共产党民族新文化观的内涵。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试图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认识和态度,从而揭示他们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将历史研究法和传播学理论结合起来,着重考察根据地报刊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特点及经验启示。



## 第一章 思想源流与政治基础

- 1 / 第一节 思想源流：“中国化”的来龙去脉
- 26 / 第二节 统一战线：文化建设的政治基础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传播

- 51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69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和影响
- 81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



## 第三章 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与社团勃兴

- 102 / 第一节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 112 / 第二节 社团的勃兴



## 第四章 报刊繁荣与文化传播

- 123 / 第一节 报刊出版的恢复与发展



# 目 录

02

- 131 / 第二节 报刊出版的兴盛
- 142 / 第三节 根据地报刊的运营与传播
- 150 / 第四节 报刊与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 第五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文化下乡”

- 174 / 第一节 文艺运动新方向的确立
- 187 / 第二节 “文化下乡”运动与农村文化振兴



## 第六章 文化建设的成就、特点及方向

- 207 / 第一节 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231 / 第二节 文化建设的特点
- 245 / 第三节 创建开放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 253 / 参考文献
- 262 / 后 记

## 第一章 思想源流与政治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以新启蒙运动为先导的文化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不断强调联合团结,呼吁中国化、大众化,要求文化要为抗战建国服务。这直接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制定,是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基础。

### 第一节 思想源流:“中国化”的来龙去脉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当思想文化界就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问题尖锐对峙、激烈冲突时,当要求共同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时,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站在唤醒民众的立场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反对迷信、武断、盲从和宣传民主、科学为己任,在北平、上海、重庆等地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sup>①</sup>。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柳湜、张申府、胡绳等人。他们除了倡导科学、民主、理性之外,在思想上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呼吁文化救亡,普遍倾向于文化运动中国化、大众化。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文化自觉,以及他们对“中国化”“大众化”问题的初期探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命题的提出,构成了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想源头。

---

<sup>①</sup> 相关研究成果包括:黄俊岭《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方敏《新启蒙运动关于新文化建设的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陈亚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研究》,中央党校2005年博士论文;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卢毅《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长白学刊》2008年第1期;庞虎《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探析》,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谭群玉《新启蒙运动下的“新哲学”与自由主义》,《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刘晓林《民粹话语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塑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等。

## 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就思想启蒙的侧重点和对象而言,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新”,不仅在于它是一场文化救亡运动,而且还在于它是一场“文化上的自觉运动”<sup>①</sup>。关于“文化自觉”及其意义,目前学术界对于费孝通先生的解释还是比较认同的。他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文明进行反省,做到‘自知之明’”,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②</sup>。回顾新启蒙运动中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论述,再考察当前知识界对文化自觉的定位,我们发现两者不仅在概念运用上相似,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于1930年11月在《革命行动》杂志上刊登的《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中已经提出了新的“启蒙运动”的概念,认为“这种批评的奋斗工作,就是我们党的神圣的工作,神圣的任务,也就是全中国青年劳苦民众的任务,也就是新的启蒙运动”<sup>③</sup>。但是,就新启蒙运动的思想本质而言,1936年秋,当时的左派文人、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无疑是学界比较认可的新启蒙运动开始的标志<sup>④</sup>。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比较早地阐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内涵和纲领。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在此背景下,知识界有必要联合起来,发起新启蒙运动,唤醒国人的文化自觉,从而努力“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

① 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文化粮食》第1卷第1期,1937年3月20日。

②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群言》2005年第1期;《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3期。

③ 邓演达:《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革命行动》第3期,1930年11月。关于邓演达与新启蒙运动的相关论证,见姚宏志《“新启蒙运动”概念的首倡者是邓演达》,《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④ 黄俊岭:《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姜文荣:《浅析新启蒙运动》,《学海》1994年第4期。

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解释”。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时代需要,他指出新启蒙运动的任务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sup>①</sup>为了救亡图存,他明确将新启蒙运动定位为文化救亡运动,指出:“我们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我们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sup>②</sup>

《读书生活》杂志由爱国人士李公朴于1935年创办,受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和“社联”影响甚深,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事实上,该刊物除了刊登陈伯达的文章之外,还刊登、出版了艾思奇、柳湜、高士其等人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柳湜的《街头讲话》,以及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是由该刊物发表、出版的。从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及其发展来看,《读书生活》杂志及其刊登、出版的著作,在推动知识文化自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探讨“中国化”问题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

为了推动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张申府、吴承仕、张友渔、黄松龄、程希孟及陈伯达等人还联合发起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号召全国爱国人士,紧急动员,团结一致,共同参与新启蒙运动,以反对日本侵略和奴役,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复古、武断、盲从和迷信。新启蒙学会的建立,使得新启蒙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团结御侮,呼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在文化界引起共鸣,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新启蒙运动的声势<sup>③</sup>。

新启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实际上是要建立“民族化”的新文化。由于新启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给予了充分发掘和肯定,指出“五四有广大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上、思想上,有深厚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事实”<sup>④</sup>。他们认为,

① 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

②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

③ 章绍嗣主编:《中国现代社团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页。

④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即“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中国民族的危机等是有着不可分的关联的”<sup>①</sup>。在他们看来,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要任务是“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从“唤醒民众”和“发现人的价值”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反封建,反礼教;一是提出“民主”和“科学”口号,彰显人文精神,即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就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昧的,只当作少数特殊人物的装饰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独断、迷信、吃人的不合理的教条,充满了这个旧文化的内容。为要对抗这种旧文化,在积极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昧。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sup>②</sup>。

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被视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环,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文化,反对礼教,推动了人性的解放,指出“五四文化运动是一个猛烈的反封建文化的运动,千古崇奉的封建的神圣(孔子)竟被人起来推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虽然旧启蒙运动在戊戌前后已经开始,但没有这一次那么壁垒鲜明,因为连动的主体自己已鲜明地独立起来”<sup>③</sup>。他们坚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孔教和传统观念,而且还在于实现价值重估,恢复事物本来面目。为此,他们指出“新思潮就是要打破传统观念,还给事物它本来的面目。譬如孔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旧的传统观念之下,孔教的价值是无限的,孔子是万古的师表,一遇到了新思潮的光辉,这无限的价值就被否定了。孔子的学说,只被看作春秋战国时代百家学说的一派;而事实上本来它也只是这么一派”。对于有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深以为然,说:“是的,在文艺复兴运动里支配着的历史规律性,在中国的‘五四运动’里也同样存在着的。中国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同样对于封建传统是一个反抗运动,同样是在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新情势和新需要之下所产生的价值重估的

① 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② 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第8期,1937年6月25日。

③ 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文化粮食》第1卷第1期,1937年3月20日。



运动。”<sup>①</sup>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意义和价值,新启蒙运动发起者也给予很高评价。他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两个口号的激发下,人的价值得以发现,人的理性得以张扬。为此他们指出:“在‘五四运动’的战士们的前面,飘扬着一面战斗的旗帜,在旗帜的正面写着‘民主’,反面写着‘科学’。这旗帜,在消极方面是对于封建的黑暗的传统思想的反抗,在积极方面是助长了‘人的发现’,助长了理性的发扬。”<sup>②</sup>在他们看来,“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不仅揭示了新文化的主旨和发展方向,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野,即所谓“新文化运动也对于人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发现了新的看法,而在五四时代更具体地表现为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要求”<sup>③</sup>。

当然,新启蒙运动之所以如此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要试图简单地复制或者重复这一运动,其根本着眼点是要在形式和内容上超越“五四运动”。鉴于此,新启蒙运动的发动者在继承和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的时候,更强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和扬弃,认为“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几步”<sup>④</sup>。在他们看来,“五四也有它的缺欠,有它的时代限制,也正不必讳言”。他们认为,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应该认识,影响应该发扬,缺欠也应该补充”。新启蒙运动要超越“五四运动”,就应该对之采取“扬弃”的态度,指出“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sup>⑤</sup>。他们相信,尽管新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有相似之处,但是,前者绝不是后者的翻版,两者还是有很多差别的,即所谓“现在的文化运动也绝不只是《新青年》和《新潮》之类的刊物的丝毫不差的‘重版’。——动的方法论仍然在这两年的文化运动中占着优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忘记

① 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② 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

③ 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④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1937年5月。

⑤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

的。正是在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对于从1928年后遗传下来的公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清算工作,进行了和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合作的”<sup>①</sup>。

回观“五四运动”,他们认为“五四”启蒙运动存在以下局限:

首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缺乏理论基础,即所谓“虽然‘五四运动’对于各种问题下了坚决的、进步性的‘判断’,但是这些判断都是出发于对于时代的直接的感觉,而不是建立在稳定的理论基础上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新启蒙运动发动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不可谓不发达,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尼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至马克思主义,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勃兴涌现的。同时,所直接接触的问题不可谓不广泛,从标点符号、公历纪元的使用,以至婚丧礼节、家庭制度、言语文字的改革,以至政治问题等,都在探讨之列,“这一切问题都要求给予解答”。但是,探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及结果,他们并不以为然,认为“五四运动”只是单个地去解答了所提出的问题,“不曾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总的根源,自然也不能给予总的解决了。而且也正因为他们不曾建立总的理论体系,因此对于个别的问题也不能看得十分清楚”。

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弱点在于,探讨问题庞杂,缺乏理论深度,即所谓:“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做理论基础——这是‘五四’时代的思想的最大的弱点!”为了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缺乏理论基础的这一缺陷,他们主张以唯物论和动的逻辑作为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认为:“今日的文化运动一定要彻底地解决‘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而没有被彻底解决的一切问题,但也一定要扬弃‘五四’时代处理问题的态度——唯物论与动的逻辑是今日的文化运动的坚实的基础!”<sup>②</sup>

其次,认为“五四运动”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上,缺乏理性和深度。考察“五四”时期思想界对儒学的批判,新启蒙运动的发动者认为,新文化知识分子虽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批孔”浪潮,“对于在过去一丝一毫也不敢侵犯的教条礼法,施以正面的打击”,但是这种反孔运动

① 胡绳:《论近两年来的思想和文化》,《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② 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

“还做得不够彻底,不够深刻”。他们把儒学批得痛快淋漓,却不了解儒学在二三千年中,“能称孤道寡的历史根源”。他们认为孔教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却“不大了解社会构成的,不大了解所谓生活状态,是封建生产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础,竟把礼教当作生活状态,于是认定社会改革,应从礼教始”。同时,他们对孔教的批判很多是流于形式,在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批判儒教的本质,即所谓:“对于儒学孔教,人们大半采取着一种排斥、嬉笑怒骂的态度。过去人们把纲常捧到天上去,如今人们却把它骂得狗血淋头,一文不值。痛快的是痛快了,干脆也的确是干脆了,但可惜缺了历史主义的评判,依然不能摇动着儒学的根底。所以‘五四’时代的反孔教运动,只使人憎恶孔教,但却未曾彻底评判了孔教。”<sup>①</sup>造成的结果是“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为了更加深入地批判封建的纲常礼教,他们主张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评判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如张申府就主张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之后加上“救出孔夫子”,将孔子和纲常礼教区分开来<sup>②</sup>。

在扬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他们赋予新启蒙运动以更为丰富的内涵,认为新启蒙运动在启发人群、教育大众方面,“必须贯彻的几点积极原则就是:一、理性的显扬;二、思想的解放;三、科学知识的灌输;四、民族意识的唤起;五、民主习惯的养成”<sup>③</sup>。

新启蒙运动发起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判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五四”以后文化界存在的问题,阐明了新文化应该坚持的方向,这对于他们呼吁“文化救亡”“文化自觉”,以及探讨“中国化”问题做了很好的铺垫。

## 二、文化救亡与文化自觉

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和扬弃的同时,新启蒙运动还为新文化运动赋予了诸多时代内涵。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积极呼吁文化救亡和文化自觉。

其一,将新启蒙运动与文化救亡运动紧密联系起来。从新启蒙运动发起者对这一文化运动的最初定位来看,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试图通过知识界的文

①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5,85页。

②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1937年5月。

③ 张申府:《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应用》,《自由中国》,1938年第2期。



化自觉和救亡,来推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而实现社会政治的民主革新。回顾“五四运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有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认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新文化,正在遭逢着被毁灭的危机”。为此,他们将新启蒙运动和文化救亡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我们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我们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sup>①</sup>在他们看来,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使之不可避免地充满着爱国主义色调,即所谓:“在最近两年来,更因为敌人无饜足的侵略使民族生命到了生与死的决定的关头,因此两年来的文化运动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色调,但决不表示文化运动的落后,恰恰是表示了它能面对现实,适当地担负了现实所赋予的任务。”<sup>②</sup>他们认为,当爱国运动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时,新启蒙运动也必然采取爱国主义形态,并且与民族解放紧密相连,指出:“社会运动既然是广泛的爱国运动,那么,文化上一切新问题的提出,也必然取着爱国主义的形态,我们的新启蒙运动,也必然要与民族解放和国防发生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当然的事。”<sup>③</sup>

为了实现救亡,他们在批判和警惕封建势力的时候,甚至主张联合一部分封建势力,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指出:“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在所不惜的。”“这一运动里即使联合了一部分封建势力,是不会被封建势力所利用,而是把封建势力引导到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方面去。”他们认为,在国难面前,新启蒙运动首先要做的就是有利于民族生存,即“国难的紧迫,也不容许我们完全推翻什么或建立什么,我们只能随时随地采取一切可用的工具去应付国难。就把‘打倒孔家店’去做例子吧。这是‘五四’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之一。这一个口号实际上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呢,因为‘孔家店’又被民族敌人所利用了。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倒不必是要彻头彻尾地把它打倒,我们要打破的,只是它被敌人利用的一方面,同时也要找出它的好的一方面,使相信这家店子的人觉悟到自己的民族的地位,使它从敌人利用的地位移到有利

①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

② 胡绳:《论近两年来的思想和文化》,《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③ 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文化粮食》第1卷第1期,1937年3月20日。